

施展

著

历史

3000年的中国

增订版

史记

# 枢纽

3000年的中国

增订版

施展

著

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博集天卷  
CS-BOOKY

©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枢纽：3000年的中国 / 施展著. --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4

ISBN 978-7-5726-1005-9

I. ①枢… II. ①施… III. ①中国历史—通俗读物  
IV. ①K209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11826 号

上架建议：历史

SHUNIU: 3000 NIAN DE ZHONGGUO

枢纽：3000 年的中国

著 者：施 展

出 版 人：陈新文

责任编辑：匡杨乐

监 制：吴文娟

策划编辑：董 卉 逯方艺

特约编辑：吕晓如 罗雪莹

营销编辑：傅 丽 杨若冰

封面设计：利 锐

封面题字：不 周

版式设计：李 洁

出 版：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680 mm × 955 mm 1/16

字 数：670 千字

印 张：37.5

版 次：2023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2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726-1005-9

定 价：12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59096394

团购电话：010-59320018

## 历史哲学写作在今天如何成为可能

拙著《枢纽》初版已逾五年。该书面市后，引发了不少争议。从一个角度来说，这实现了最初的写作意图，该书本就是要突破既有问题域，呼吁人们进入范式反思，重新定义问题，这种努力引起争议，毫不意外。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并未实现写作意图，因为争议虽多，进入到范式反思层面的探讨却比我期待的少很多。

另一方面，该书问世后不久，世界仿佛按了加速键，进入迅猛的变迁节奏，各种冲突连绵不断愈演愈烈，短短几年时间，很多领域已经面目全非。由于《枢纽》的下篇有较多关于现实的论述，已然面目大变的世界，对书中的相关论述也提出挑战。

我已在再版的末尾增补了一章，将这几年的新思考整合总结了一下。在这篇再版序言中，我想就本书的写作意图再做个简单阐述。实际上，范式反思与现实的疾变，恰是同一个问题的两面。下面先从现实的疾变谈起。

### 一、现实的疾变

2018年以来的贸易战，2020年以来的疫情，2022年的俄乌战争，将世界裹挟入越来越大的漩涡，每个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认真挖掘，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系列漩涡的生成，都与近年来的诸多失衡有着深层的关联。

《枢纽》第七章中提出的“全球经贸双循环”假说<sup>1</sup>内蕴着一个推论，就是该循环结构意味着全球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的日益不一致，这就导致了一系列失衡。20世纪90年代，全球贸易当中有70%以上是制成品贸易，不到30%是中间品贸易，大部分产品是在单个国家内部完成生产的；到2018年，全球贸易当中有70%以上是中间品贸易，不到30%是制成品贸易，大部分产品都是横跨多个国家完成生产的，“全球经贸双循环”结构是这一变化的表现形态之一。贸易战通过关税进行，但只有在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大致一致的情况下，关税才能达到贸易战所期待的效果；如果两个空间不再一致，则经济活动有各种办法规避关税的控制。

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的不一致蕴含着风险。诸多国家彼此在经济上有着如此之深的相互依赖关系，一国的内政行为会通过经济过程的传导，对其他国家的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即便是经济活动本身也会外溢出诸多政治效应。如果没有一种超国家的政治安排来为这些溢出效应提供必要的缓冲，形成制度保障，便有诱发动荡的可能。

《枢纽》在第七章里曾经引用印度经济学家拉詹的一段分析：“魏玛德国在20世纪20年代从国外大量举债以维持国内的消费繁荣，缓解困扰本国的潜在社会矛盾；如果没有美国借债让德国保持经济活力，德国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可能造成威胁整个欧洲的严重问题。但是美国和德国之间金融关系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因为两国都没有为这种资本流动的潜在政治含义做好准备。美国不愿意为德国商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市场，而德国商品出口正是德国偿还债务的手段。同时，美国并没有采取任何政府措施来缓解德国在经济上

---

1 这个假说提出，中国经济的崛起带来了全球产业格局的极大重构，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形成广义的二三产业循环，中国与非西方国家之间形成广义的一二产业循环，中国作为全球中低端制造业的中心，成为衔接两个经贸循环的必要枢纽；这样一种解释还可以略作变形，就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全球日益分化为资源国、生产国、消费国三种类型的国家，生产国主要是中国，消费国主要是西方，资源国主要是诸多非西方国家，中国衔接两方。在对拙著的讨论中，曾出现过一种误解，以为我所谈的“枢纽”是说中国已成“世界中心”，但实际上，“枢纽”仅仅是指在最新一轮创新经济带来全球产业大分工的时代，中国的一种特定的结构性地位，它衔接着两大循环，但这并不是说它成了中心。该假说在贸易战中似乎受到挑战，但2019年我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进行的深入调研表明，“全球经贸双循环”的结构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只是结构的具体形态发生了调整，相关讨论参见施展《溢出：中国制造未来史》，中信出版社，2020年。

的困境，德国不愿意也不能够做出偿还债务所必需的牺牲。”二战之后组建了几大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其前身为关贸总协定，即GATT），目的就是回应这个问题，为各国间的经济关系提供政治基础。

这几大国际经济组织是以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大致一致为前提而设计出来的，当时运转还算有效，但到今天，现实已经侵蚀掉了它们的基础，各国间的经济关系重新进入缺乏政治基础的状况，风险就浮现出来了。这是近些年各种国际矛盾的深层原因之一。

《枢纽》第七章中以WTO为例进行了关于国际治理秩序的讨论，随着近几年我的新思考，里面的一些具体内容可能已经需要迭代，但是其中的基本的方法论仍然是成立的，所以我并未调整正文中的内容，但在这篇再版序言以及最后的增补篇章中做了进一步的讨论。

经济空间的运行脱离于政治空间，政治空间所承载的福利功能便会遇到挑战，因为福利依托于经济；民主政治以既有的政治空间为基础，福利问题就会在民主政治中引发反弹，形成有民粹气质的政治。内政问题会溢出为外交效应，各国的内部困境如边疆困局等，也会在外交上被作为博弈杠杆。

通过这些简单的讨论可以看出，今天的世界正在遭遇整体性的失衡。失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规范与现实之间的失衡，一是范式与问题之间的失衡；前者相对容易理解，后者需要简单再解释一下。在我们观察世界的时候，问题并不是自动浮现的，它是通过理论范式而被我们把握住的，比如，面对同样的天文观测数据，地心说和日心说两种范式所提出的问题会截然不同；每一种范式都有其适用边界，如果现实已经演化得超出该范式的适用边界，该范式所提出的问题就不再是一种有价值的真问题。所以“范式与问题之间的失衡”，准确来说应该是，随着现实的深刻变迁，范式与真问题之间出现了失衡。

一旦进入到这种失衡状态，就需要提出一种“元问题”，要对范式本身进行反思。整体性的失衡，需要一种整体性的视野才能对其提出真问题，局部性的视野只会让世界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与把握。范式是对“整体”进行定义的，范式反思天然地要进入一种整体性的视野，这对今天的世界和中国极为重要。

## 二、范式反思与历史哲学写作<sup>1</sup>

严格说来,《枢纽》一书的写作并不是历史学的写作,而是历史哲学的写作。我在研究里并没有发现什么新的史实,调用的都是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这些卓越的成果,就像一颗颗散落的珍珠,每一颗都非常有价值,一旦找到一个好的论述框架,把它们串联起来,不仅每一颗珍珠的价值都会被充分表达,而且由于它们进入了一种结构性的观念秩序当中,每颗珍珠具体的意义也可能会发生深刻变化。这种结构性的观念秩序,就是历史哲学。

这种历史哲学式的写作,也带来了本书的两种读法。一是从头到尾读下来,这是由哲入史的读法;一是跳过高度哲学化的“绪论”章,直接从第一章“地理与历史”开始阅读,读完正文再回头来读开篇的“绪论”章,这是由史入哲的读法。后一种读法的阅读体验可能比前一种还要更好些。

有朋友质疑历史哲学写作的价值,在我看来,历史哲学的写作在今天不仅仍然可能,甚至是必须的。因为范式反思的底层,便应是一种历史哲学层面的反思。尤其是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因为它处在一种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与焦虑当中,无论是在对内还是在对外的层面上;历史哲学的重构,可以为克服这种焦虑提供一些必要的前提。

我在《枢纽》的导言中提到:“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我身份,要基于两种理论叙事来构建:一是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其所要追求的正义之目标;一是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认同边界,确认何者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两种叙事加在一起,才会带来政治体的精神凝聚力。单纯依靠政治哲学的价值表述,无法回应该共同体的特殊历史处境;单纯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则无法理解共同体与世界之间的内在一致性。”

在这个意义上可知,历史哲学是政治哲学的一种特殊形态,但它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政治哲学。对政治的研究与写作,关涉到三种学科进路:历史哲学的写作,政治哲学的写作,以及政治社会学的写作。我想先对后两种进

1 由此向下的讨论,有相当部分出自我在《枢纽》讨论会上的一篇回应文章,参见《重述中国:从过去看见未来》(笔谈),《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6期。

路的学科边界加以一定的解释，再返回来讨论历史哲学。

政治社会学研究的起点是搁置价值判断，先说清问题是什么，也就是实然研究。而政治哲学则是提供一套叙事逻辑，使得未定型的现实被导入某种规范化的秩序，让各种具体存在都获得统一连贯的意义和判断标准，它并不负责对现实给出一套真实的刻画与解释，却能为现实赋予确定性，也就是应然研究。假如现实的逻辑跟政治哲学的路径不匹配，那政治哲学就只是个理想的目标，但我们没法解决怎么达成那个目标。此时便需要一套政治社会学的分析工具，把现实跟政治哲学联结起来。但因为政治社会学只关注现实，搁置价值判断，有可能导向某种很强的价值相对主义，所以需要政治哲学为它充当一个终极的锚，来锚准这个方向，但这个锚本身并不负责解释现实，否则锚就不稳定了。

而历史哲学则同时兼有实然与应然两种气质。它需要在实然层面说清楚历史过程，又需要在应然层面对历史过程给出某种规范性的意义赋予，如此方能在历史叙述中将共同体的身份边界打造出来。所以，在《枢纽》一书的写作中，我尝试以历史哲学的手法来整合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方面的思考。先把价值判断、政治哲学搁置起来，从政治社会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这一系列角度，从古代到当下，把整个中国历史演进的逻辑尽量完整地梳理出来，然后我才能知道，哪种政治哲学的叙事逻辑有可能驯化这样一种历史逻辑；政治哲学有多种叙事逻辑，诸多派别，没有哪种叙事逻辑能适应所有历史处境。但用这样一种写作方法的代价是，我所调用的实然与应然的不同思考进路有可能会相互影响对方的理论逻辑；以及，在实然与应然之间经常地来回跨越，还会容易让人把我在书中所做的事实判断当成价值判断，形成误读。《枢纽》出版后遇到的很多批评，都是与这种误读有关的。

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二分中，又会有一个新的质疑被提出来：对价值判断的搁置，是否能够成为可能。我的回答是，“搁置”是分层次的或者说分位阶的，在一定位阶上的搁置完全有可能，但这以在另一些位阶上不搁置为前提，否则甚至连提出问题都不可能。因为，对问题的提出，首先要有一个被提问题的对象，而对对象的取舍，已经包含某种价值判断在内了；在给定的对象的前提下，在这个层面上，对价值判断的搁置是可能的。

历史哲学中所包含的应然性表达，还会引出一种质疑：它似乎是在寻找一种“历史规律”，但“历史规律”真的存在吗？我对此的回答是，历史哲学的写作不是要发现历史规律，其应然表达会有某种似乎像是“历史规律”的外观，但这只不过和政治哲学一样，是要找出一种精神秩序，对各种特殊性加以某种规范性的整合，从而对价值与方向给出引导与约束。历史哲学所呈现的“规律”并不指向一种实然存在，而指向一种应然判断。

有些朋友也注意到了我的写作是一种历史哲学式的写作，但他们对我采用黑格尔式的哲学框架有不同意见。实际上，我的这种框架选择，与我对中国近代转型历史的理解有关。

近代中国的转型历史极为动荡起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代价发生在对外与对内两个方向上。从对外来说，正是外部世界的压力与冲击，启动了中国的转型历程，这也是一直自视为天下的传统中国逐渐获得自我与他者相区别的边界感，其自我意识在与世界的互动中逐渐生成的过程。值得指出的是，这并不是中国单方面地被动接受的过程，中国的体量决定了，西方冲击中国的过程，反过来也会在西方世界造成改变，因此这是西方、中国各自的自我意识不断地相互激发、相互生成、共生演化的过程。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当中所提到的“主奴关系”辩证法，可以提供一种宏大的视野与格局，对这样一种过程有着强大的整合能力；不至于过多地偏重于抽象价值的表达，从而对历史的某些面相会有一种拒斥。在我们过去的历史叙述中，经常把中国近代史表达为一种屈辱史，然而在黑格尔式辩证法中，正是这段历史为中国的自我意识的不断充实提供了基础。

这样的整合方式，就能不仅仅是从具体的史实层面超越对近代的屈辱史叙述，也从哲学层面超越了它。倘若屈辱史叙述不能被超越，则中国只有与世界在绝对意义上相对抗，才能成就自身，这种叙述在当下直接就会引导出狭隘的民族主义，要把中国与世界相对立起来；而中国正是在加入全球秩序之后才获得了高速的发展，至今仍受惠于此，狭隘民族主义无疑是有悖于中国的利益的。借用黑格尔式的框架，则能够在一种历史哲学的叙述中，直面中国与世界的对抗关系，并从中发现更加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这对当下无疑有着重要意义。

从对内来说，中国在转型过程中有着各种血泪、心酸、痛苦与死亡，中

华民族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很多自我撕裂。中华民族要想实现自我和解，此前历程中各种阵营与派别的痛苦与死亡，便都需要获得意义。否则，撕裂就始终无法被弥合，始终会有一部分人被历史性地甚至被现实性地排除在人民的范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民族的自我意识便仍有残缺，民族的自我立法过程也就仍未完成。黑格尔哲学的历史辩证法，可以在民族的精神生成史当中，将各种战争与死亡都整合为统一的历史进程，让它们都成为民族精神生成史当中的路标，它们以不同的方式与角度激活民族的自我意识，便都能够获得意义，并上升为牺牲，从而为民族的自我和解提供一个重要的哲学路径。

这个民族的内部，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整体抑或局部，若哪一个层面未曾被整合进来，则民族的精神自觉便仍未完成，它可能仍然面对着自身社会中某种形式的内在对抗性，但这种内在对抗性，却恰恰是不断向更深层次激活民族的自我意识的基础。

### 三、可欲与可能

还有些朋友质疑，我在《枢纽》中所采的政治哲学取向，是一种从权力出发的霍布斯路径，而非从权利出发的洛克路径，但霍布斯路径很容易带来对权利的伤害，为何不从洛克路径出发？后者显然更加可欲。

然而，“可欲”与“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事情。霍布斯路径与洛克路径，哪一种能够成为可能，有历史处境差异的问题。英美的历史处境与法德这种大陆国家的历史处境是不一样的。英美走的显然是洛克路径，在这个路径里，天赋人权是整个理论架构的基础前提。但是霍布斯曾经提问，在“人对人是狼”的自然状态当中，所谓的“权利”由谁来保障？没人能够保障的话，“权利”就相当于没有。因此，霍布斯所关注的首先是政治奠基的问题，这才能让权利的保障者出现。再一次地，因为内在于人性的一些困境，讨论政治奠基问题的起点就只能是权力。此处还要多解释一句，我所说的政治奠基当中的“政治”，或者说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其核心问题是对共同体的打造与健康延续，共同体的打造不仅仅是个权力问题，更是个政治哲学的问题，打造成功之后，权利始获得其基础。法德这种大陆国家，走的就是广义的霍布斯路径。

中国的历史处境更加类似于法德，所以我并不认为“可欲”的洛克路径在这里是个“可能”的选项。

说了这么多，还要回答一个更加凛冽的问题，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层面的理论努力，对历史究竟能有多大影响呢？有很多历史条件的孕育，不是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的写作所能替代的，于是这种写作颇有些知其不可而为之的色彩。然而，学者的本分也许就是要做这样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努力吧。

# 序

---

施展送来他的大作，希望我给他的新书作序。

施展是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组织的学术共同体“大观”团队的成员。我2007年应邀担任世观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那时我就提议研究院要发现、扶持青年研究人员，组建有持续性的青年研究团队。“大观”团队自2008年开始运行，就一系列课题进行了持续研究，包括重新认识中国的周边世界，重新理解中国成长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大观”团队近期的研究重点，落在了对中国革命的伟大成果向现代国家转化的历史过程的研究上，开辟了“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国家理论”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大观”团队的年轻人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未来的世界秩序是由中国加入这个秩序的过程所塑造的，中国的成长与转型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实现。我非常欣赏和支持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辩证法的，也是符合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一百多年的奋斗历史的。

施展在“大观”团队中非常用功，多次深入到实际工作当中，览群书，行列国，积累了见识，逐渐形成了有他自己特点的一系列见解。现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把这些观点系统地扩展为60多万字的一部专著，值得庆贺。

在此书中，施展试图在一种新的全球史视野下，重新理解传统中国以及以中国为文明核心的东亚世界的历史，并把这个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相遇作为伟大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及其观念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世界观念，促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推动着中国高速成长，中国力量正在融入并重组世界秩序。作者在书中详细分析了这个宏大历史过程的内在机理。看得出来，

作者有意避开了传统或经典的通史叙述方式，而以政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秩序演变为线索，以秩序构成诸要素的分析作为全书的主要内容，形成了气象壮阔的论述格局。当然，这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中国通史，也不是专门的政治学著作；这是这一代青年人在大时代进行大构想的一个可贵的尝试。

无论如何，世界已处于根本变化之中，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亚非几十亿人民蓬勃发展，此长彼消，旧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瓦解，新的世界观、国家观正在走上前台，引导全球秩序的新格局。对这种新格局的认识，需要有新的理论努力和勇气。正如傅莹同志在2017年的瓦尔代会议上引征施展的观点后所言：“超越地缘政治既是中国发展的切身体会，也是世界发展的潮流所向。未来，世界各国应该携手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退回到地缘博弈的格子里去。”<sup>1</sup>

施展在书中提出一系列设问，也提供了相应的回答。其中肯定有很多会引起争议和讨论。我一向支持这样可以引起讨论、争议甚至批判的文章，这样我们的思考才可以精进。当然同时我也希望施展要不断修正、发展自己的思考和理论，因为这部著作的主题甚为宏大，应当在争议、讨论中发展，以虚心求真务实的态度持续研究下去。期待以后还可以看到修订版。

在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同志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历史判断。这个伟大的新时代不仅要求执政党提出新的思想、新的方针路线，还向我们中华民族提出了新的理论思维的任务。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个民族的新的理论思维就是这个民族青年一代的理论思维。我这一代人，饱经国运沧桑，目睹历史曲折，深感理论思维薄弱，民族尚处追赶途中，容不得半点骄傲与松懈。万望青年一代学者，屏息聆听历史的脚步声，苦思冥想，深思熟虑。伴随着国家强盛，民族也达致理论成熟，这也正是施展在书中所提到的世界历史民族的双重含义吧。



1 瓦尔代会议是俄罗斯组织的年度国际学术会议，2017年已是第十四届。普京总统参加了历届会议。2017年傅莹同志在会上做了题为《要冲突还是要合作？超越地缘政治思维》的发言，并在发言中引征了施展的观点。

## 十字路口的大国与历史热

最近几年，中国兴起了历史热。图书市场上出现了大量从各种视角重写中国史的著作，既有国人的著作，也有译著；既有传统式的史学著述，也有跨学科的历史研究，并且往往都出人意料地大卖。<sup>1</sup>

1 做一个简单的梳理，可以看到如下有代表性的著作与学术努力。赵汀阳先生在《天下体系：惠此中国：作为一个神性概念的中国》等著作中对“天下”观进行了着力阐发，力图在传统中发掘出现代中国的普遍主义视野之可能性，许纪霖先生也曾在多篇论文中做过相近的努力；但是这些对“天下”观念的再发掘，忽视了塞北、西域等地区并不是由儒家文化主导的，因此对这些边疆地区情况的说服力和解释力可能会遇到困难（近年可看到许纪霖先生有了对边疆问题的大量关注），并且从观念到观念的叙事，也会流于空泛。葛兆光先生在《宅兹中国》《想象异域》等著作中通过对周边朝贡国史料的挖掘，呈现出从周边看中国的不同视角，对纯粹基于中原的秩序想象是一个很大的思想刺激，但这种视角同样将遇到“天下”体系所会遭遇的质疑。姚大力先生、罗新先生的诸多著作，从草原史、内亚视角开启了不同于中原视角的中国史反思；这种反思非常有启发性，但对于内亚与中原的历史共性何在，尚需给出更进一步的解释。王柯先生在《民族与国家：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思想的系谱》一书中，对中国内在的多元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但对多元要素的共性基础的发掘还需进一步深入。赵鼎新先生在《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等著作中，回溯到中国历史的早期，从战争与政治秩序的生成关系的角度再论了中国史；这种分析角度使用了以往史学研究中较少运用的社会学方法，但是对非中原地区的解释力仍不足。王明珂先生、马戎先生等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华民族的概念进行了全新的思考；这样的人类学思考对历史学是一个巨大的补充，但是过于强调了社会层面的自生秩序，而对政治层面建构秩序的同情式理解似有不足。国外学术界在这方面也有相当多的思考，诸如美国新清史学派对大清帝国的内亚性的探讨，日本京都学派对中国史的重构，以及剑桥的中国史系列、哈佛的中国史系列等等。这些思考都极富启发性，外国学者有他们不同于中国学者的问题出发点，因此更多是他山之石的价值，而不足以成为中国理解自身的基础。此处的梳理只是从有代表性的几个入思角度展开，必定挂一漏万，除此外所列学者之外，还有许多学者做出了大量值得钦佩的研究，我也从中受到许多启发，篇幅所限，恕无法一一列出。

实际上，历史热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揆诸世界历史，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其崛起本身会造成所处体系的深刻变迁，过去所习惯的参照系不再起作用，基于该参照系所设定的国家目标也会失效；于是，它无法再说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往往会陷入一种深刻的身份焦虑。它懵懵懂懂地走到了没有路标的十字路口，不知何去何从。在这个路口，倘若它能够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中，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内在一致性，就能够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对世界的建设性力量，并真正成就自己的世界历史地位；否则，它将浪费自己所经受的苦难。为了真实地理解自己的处境，以避免糟糕的前景，处在十字路口的大国往往都会关注历史，它们渴望通过对历史的重新理解，来廓清当下，构想未来。

这种身份焦虑的化解，无法简单地通过对某种价值理念的表述及追求而完成。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自我身份，要基于两种理论叙事来构建：一是政治哲学的叙事，它会为该政治体确立其所要追求的正义之目标；二是历史哲学的叙事，它会确立该政治体的认同边界，确认何者为自己人，何者不是自己人。两种叙事加在一起，才会带来政治体的精神凝聚力。单纯依靠政治哲学的价值表述，无法回应该共同体的特殊历史处境；单纯关注历史的特殊性，则无法理解共同体与世界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当下中国的身份焦虑，实际上表达着对新的历史哲学或者说新的历史叙事的渴求；人们渴望通过对中国各种特殊性的统合性叙述，来寻找中国通达于普遍性的根基，以化解对内对外的各种精神紧张。简单来说，就是要在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上，回答“何谓中国”这一问题。这样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直观上呈现为对过去的重述，实际上是在勾勒未来的方向；换言之，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是基于对过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就是未来学。

要构建新的历史叙事，首先需要对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的理解。只有深刻理解这一特殊性，才能把握其在普遍性当中的结构性地位。那么，中国历史的根本特殊性在哪里呢？

本书认为，它体现在两点上：一是中国是一个轴心文明的载体，一是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两点以一种人们经常意识不到的方式相互发生作用，几乎中国历史的所有运动逻辑，理解当下中国问题的所有切入点，都在对这两点的把握里面了。

所谓轴心文明，即在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之间的轴心时代出现的原生性文明。这个时候出现的中国文明，或许曾受到过其他文明的激发，并且在后续的年代中吸纳了很多其他文明的精神资源，但其内核中一些原生性的东西，作为基本识别要素始终存在。轴心文明的特征在于其普遍主义取向，绝不自囿于一族一地，而是以天下为思考单位；对应地，轴心文明不会设定自己由某一特定族群担纲，它所关注的只是文明本身是否获得普遍传播。轴心文明的这一特征，使得中国的精神结构中天然地有着普遍主义的冲动。在古代，它将自己理解为世界本身；在现代，它只有通过普遍主义才能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因为单纯的民族主义理念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容量，以支撑起它的精神世界。

很多轴心文明在历史过程中都丧失了自己的政治载体，但东亚的轴心文明却一直有中华帝国作为其政治载体，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历史效应。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根本上来说，是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超大规模首先体现在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与财富上，其规模达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在第一个千禧年过后，朝廷（中央）以低成本汲取资源的能力超过了任何地方性势力能抗拒的程度，此后中国再无长时期的分裂现象出现，于是就有了国人经常说的“唯一历史未曾中断而延续至今的文明古国”。其延续性的根基并不仅仅在于其文明的韧性，更在于超大规模所带来的军事与财政逻辑。

说得更准确点，一个庞大政治体的自我维持与轴心文明的存续，是两个独立的逻辑，并不能相互解释，但是相互有需求。这个文明在其覆盖区域内始终可以找到一个独大的强国作为其载体，该强国则始终可将该文明作为自己的身份识别标志。而在其他文明区域内，由于没有这种超大规模，没有足够的可供低成本汲取的资源，能够压制各种地方性力量的独大的强国就很难持续存在，也因此，若干彼此相持不下的强国便不会将文明作为自己的根本身份标志，以免混同于其他国家。

中国轴心文明的担纲者在古代的流转，最终必会落在起自农—牧过渡地带的人群身上——过渡地带分布在长城沿线及东北。因为只有这个群体同时熟稔农耕与游牧两种体系的秩序奥秘，能够带来超越于农—牧的多元治理，使长城南北的紧张关系转化为统一帝国的内部均衡关系。他们对中原的理解能力使其能够调动中原的庞大财富，这是纯粹的草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他

们的草原身份又使其拥有超越于中原的广阔视野，有能力统治儒家文化无法直接整合的庞大非中原疆域，这是纯粹的中原统治者很难做到的。因此，这个群体能构建起庞大的多元复合帝国，使得轴心文明所构想的“天下”外化为一个现实的帝国秩序。这种多元复合帝国也带来了中国的另一重超大规模性，即地理上的超大规模性和帝国内部秩序上的超级复杂性。这两个意义上的超大规模性，使得中国在现代转型时面临的任務变得极为复杂。

在担纲者的流转过程中，中国历史经历了复杂的变迁，变迁的主动要素，或者说自变量，来源于社会分工最为复杂的中原地区。相对于非中原地区而言，其分工的复杂性使得内部各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更为易变。每一次出现有历史意义的技术跃迁，都会给中原带来新的经济资源，并打破此前诸种社会要素的均衡关系，也就是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旧有的和新出现的各种社会力量，会在动荡与博弈中走向新的均衡，中原的社会结构就这样经历过几次深刻变迁，从商、周之际的封建社会转化为汉、唐之间的豪族社会，再到宋、清之间的古代平民社会。社会结构的变化，会改变中原地区的财政与军事逻辑、帝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对力量关系、轴心文明的经典阐释框架，以及中原地区与非中原地区的互动模式。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这片被称作“中国”的东亚大陆的土地上，数千年的历史呈现为一个多元体系的运动过程。这个体系内部包含着中原、草原、海洋、西域、高原等几种主要的自然-社会-经济生态区域，各个区域彼此间有着极为深刻的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以至于脱离一方完全解释不了另一方。几大区域构成的多元复合结构里，历史运动的主线是草原、中原、海洋这三大区域的互动关系；西域和高原这两大区域构成副线，它们就像催化剂，影响着主线的发展路径和历史节奏。这样一种深刻的有机联系，让各个区域互为条件，构成一个多元共生体系；所谓“中国历史”，就是这个多元共生体系的演化史。这一体系不断地寻求从多元主体相互对抗的外部均衡，演化为多元复合帝国的内部均衡；中原地区每一次社会结构的变迁，都将打破业已演化出的多元帝国的内部均衡，于是体系会回到外部均衡，前述运动过程在更高一阶上再重复一轮。由此构成了中国历史循环上升的逻辑过程。

经过几轮反复演化，这个多元共生体系在其古代历史中落实为大清帝国，汉满蒙回藏多元主体都被纳入统一的帝国之中，接受其多元的统治。就当时